

政协珠海市委 编

张晓辉 苏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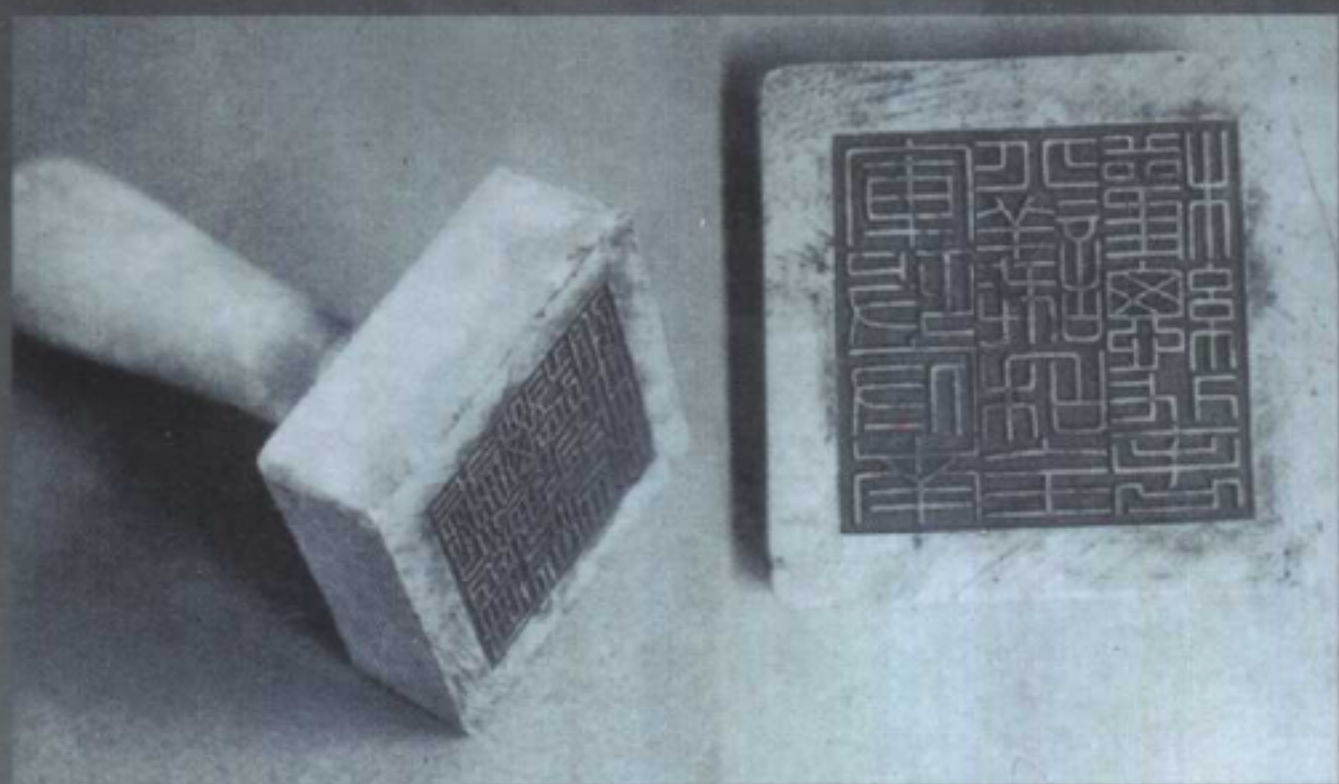


TANGSHAORYIZHUAN

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唐绍仪传

珠海出版社



ISBN 7-80689-331-8



9 787806 893319 >

ISBN 7-80689-331-8

K · 59 定价: 28.00元

张晓辉 苏苑 著



唐绍仪传

政协珠海市委委员会 编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绍仪传 / 张晓辉, 苏苑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4.7

ISBN 7 - 80689 - 331 - 8

I. 唐... II. ①张...②苏... III. 唐绍仪 (1863
~ 1938) - 传记 IV. K827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8354 号

唐绍仪传

©张晓辉 苏苑 著

终 审: 罗立群

责任编辑: 李向群

封面设计: 嘉扬设计仓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 0756 - 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1

邮 购: 0756 - 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 址: www.zhcbbs.net

E - mail: zhcbbs@zhcbbs.net

印 刷: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mm 1/32

印 张: 12 字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689 - 331 - 8/K·59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赠给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学

学会 惠存

广东省珠海市政协文史委

二〇〇五年四月一日

目 录

第一章 少年得时 留学美国	(001)
一、不平凡的家乡与家世	(002)
二、西式教育的成长历程	(005)
远渡重洋 留学美国	(005)
沐浴自由 逐渐西化	(008)
被撤回国 晋身仕途	(012)
第二章 外交新星 崛起政坛	(016)
一、出使朝鲜 办理交涉初露锋芒	(016)
与袁世凯“一见契合”	(016)
出任龙山商务委员	(019)
代理交涉通商事宜	(023)
临危不惧护袁脱险	(025)
二、再赴朝鲜 维持残局不负使命	(027)
独力支撑战后残局	(027)
竭力维护中朝关系	(029)
三、调往天津 承担北洋外交重任	(032)
助袁处理山东教案	(032)
津海关道成就斐然	(036)
四、印京谈判 维护主权功不可没	(041)
狼烟骤起 西藏危急	(041)



唐绍仪传

虎口探食 力争主权	(045)
北京议约 挽回主权	(050)
第三章 朝廷高官 政绩卓著	(054)
一、主持路政 力挽利权	(054)
督办全国铁路	(054)
修改沪宁路约	(056)
订定九广路约	(057)
改定苏杭甬路约	(058)
二、会办税务 收束关权	(061)
立誓正关权 得意下马威	(061)
排除干扰 整顿海关	(063)
三、参与东北问题谈判	(067)
中日东北善后谈判	(067)
中俄东北问题谈判	(069)
处理教案 推行禁烟	(071)
第四章 封疆大吏 壮志难酬	(076)
一、出任奉天巡抚 致力抵抗日本	(076)
出任奉抚 中外舆论瞩目	(076)
维护主权 阻止安奉改道	(079)
寻求对策 拟筑新齐铁路	(083)
英日妥协 新齐计划失败	(087)
二、踌躇满志使美 徒劳无功而返	(090)
联美制日 精心策划	(090)
日美谅解 联美失败	(094)
政局变化 被召回国	(100)
游历欧洲 考察财政	(106)

三、北洋集团干将 晚清新型官僚	(111)
北洋集团干将	(111)
晚清新型官僚	(116)
第五章 开国功臣 护国志士	(122)
一、倾心共和的议和代表	(122)
、仕途受挫 心灰意冷	(122)
风云际会 出任和谈	(126)
倾心共和 调和南北	(128)
促成共和 功不可没	(132)
拥袁称雄 贻误民国	(136)
二、恪遵约法的内阁总理	(139)
出任阁揆 欲展宏图	(139)
筹组内阁 阻力重重	(142)
比国借款 惹起风波	(145)
维护约法 愤然辞职	(148)
与袁决裂 势所必然	(151)
三、反袁复辟的护国志士	(156)
反对独裁 劝袁辞职	(156)
声讨复辟 倾力护国	(159)
第六章 同谋护法 调和立国	(166)
一、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	(166)
反对段祺瑞对德参战与毁法	(166)
南下参加护法斗争	(172)
代表孙中山出访日本	(179)
二、第二次南北议和的南方总代表	(185)
南北议和前的形势与较量	(185)



第一轮谈判及其停顿	(195)
谈判赓续及其破裂	(202)
卷入复杂的派系斗争旋涡	(209)
为恢复和议作最后努力	(211)
第七章 爱国有情 恪守信念	(220)
一、祭奠英烈 益爱国爱乡情愫	(220)
悼念英烈 情真意切	(220)
支持“五四”学生爱国运动	(223)
联络乡谊 关心乡里	(227)
协助孙中山讨伐桂系军阀	(230)
二、与孙中山政见分歧逐渐加深	(237)
企图组建稳健派大政党	(237)
坚持“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	(242)
倡导联省自治运动	(245)
无原则调和孙、陈冲突	(255)
游离于国共合作之外	(260)
断然拒绝与段祺瑞合作	(265)
最终淡出权力中心	(274)
在上海从事社会活动	(278)
第八章 能上能下 造福桑梓	(281)
一、从反蒋到归顺中央	(281)
二、主政中山模范县	(292)
出任中山县训政委员会主席	(292)
兼任中山模范县县长	(297)
三、致力于桑梓建设	(302)
中山港建设的规划和实施	(302)

整顿市容与发展实业	(307)
加强乡村建设和发展农林渔业	(311)
发展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	(313)
四、因“兵变”而被迫辞职	(318)
第九章 晚节未失 惨遭杀害	(324)
一、日伪的阴谋与诱惑	(324)
日本政府的“南唐北吴”谋略	(325)
汉奸炮制的“和平救国”文件	(333)
可疑分子的诡秘踪迹	(335)
二、中国国民党的笼络与游说	(336)
密切关注与监视唐的动态	(337)
劝诱唐绍仪离沪赴港	(338)
利用唐探寻与日议和之条件	(341)
三、卷入政治旋涡的中心	(343)
关于抗战问题的政治倾向	(343)
在上海与故旧的隐蔽交往	(347)
在复杂矛盾中陷入困境	(349)
四、横罹暗杀 惨死沪滨	(350)
军统蓄谋暗杀 唐被一斧夺命	(351)
案发后社会舆论大哗	(354)
中日双方利用唐案各做文章	(356)
凶案侦查不了了之	(359)
尾 声	(360)
唐绍仪大事年表	(363)
唐绍仪子女亲属表	(375)
后 记	(376)

第一章 少年得时 留学美国



近代中国社会变动不居，这一时代的风云人物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起落浮沉。清末民初政坛名人唐绍仪的政治生涯，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轨迹。在内忧外患交相侵逼之下，古老的天朝上国逐步衰落，中国人则逐渐觉醒，从闭关自



珠海市唐家湾



唐绍仪传

守开始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学习，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人改变命运的重要契机。唐绍仪生逢其时，有幸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代官费留美学生，得以接受当时世界先进文明的熏陶，其个性人格、价值观念、政治理想都在此期间得到培养和塑造，其日后辉煌事业的基础也在此初步奠定。

一、不平凡的家乡与家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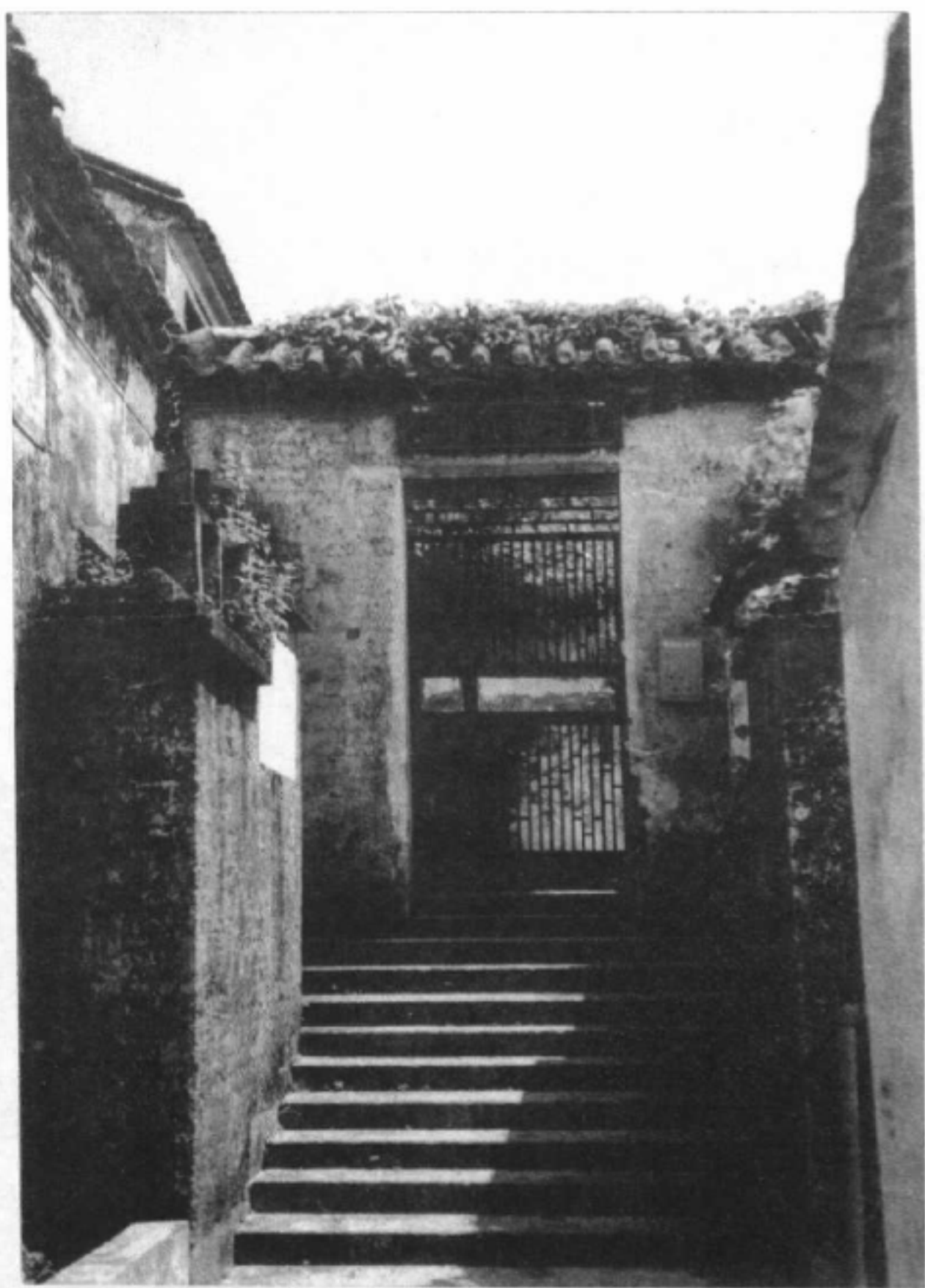
唐绍仪的家乡广东香山县唐家村（今属珠海市），位于珠江出海口西面的海隅之区。唐家村古名釜涌境，公元前后还属于“土广人疏”的“不毛之地”。南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唐姓始祖从广东南雄府始兴县牛田坊珠玑巷迁来，子孙繁衍后一支在东莞县，一支在临近的鸡山村。其后于南宋末年（约1276年前后）又有梁姓从珠玑巷迁来。从此，唐、梁两姓同居一村，互为姻娅。随着岁月的播迁和历史的演变，“子孙蕃昌，科名鼎盛”，至16世纪初，釜涌境之地名已被“唐家村”取代^①。

明朝以来实行海禁政策，唐家村与中国广大农村一样，处于贫穷落后的小农经济时代。但是，由于香山处于广州与“夷商云集”的澳门之间，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唐家人有机会接触许许多多域外的新鲜事物，眼界大为开阔，对“西方老番”和“西语西学”见惯不怪，习以为常。久而久之，当地人与洋人打起交道，学西语当翻译，做买卖经商往来。所以，还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便有一部分人不再种田而外出经商贩运。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五口通商”的发展，唐家人的经济

^① 唐有淦：《唐家村史·人物志》，珠海市唐家镇人民政府编印，第11~12页。

唐绍仪故居院门



Tang Shao Y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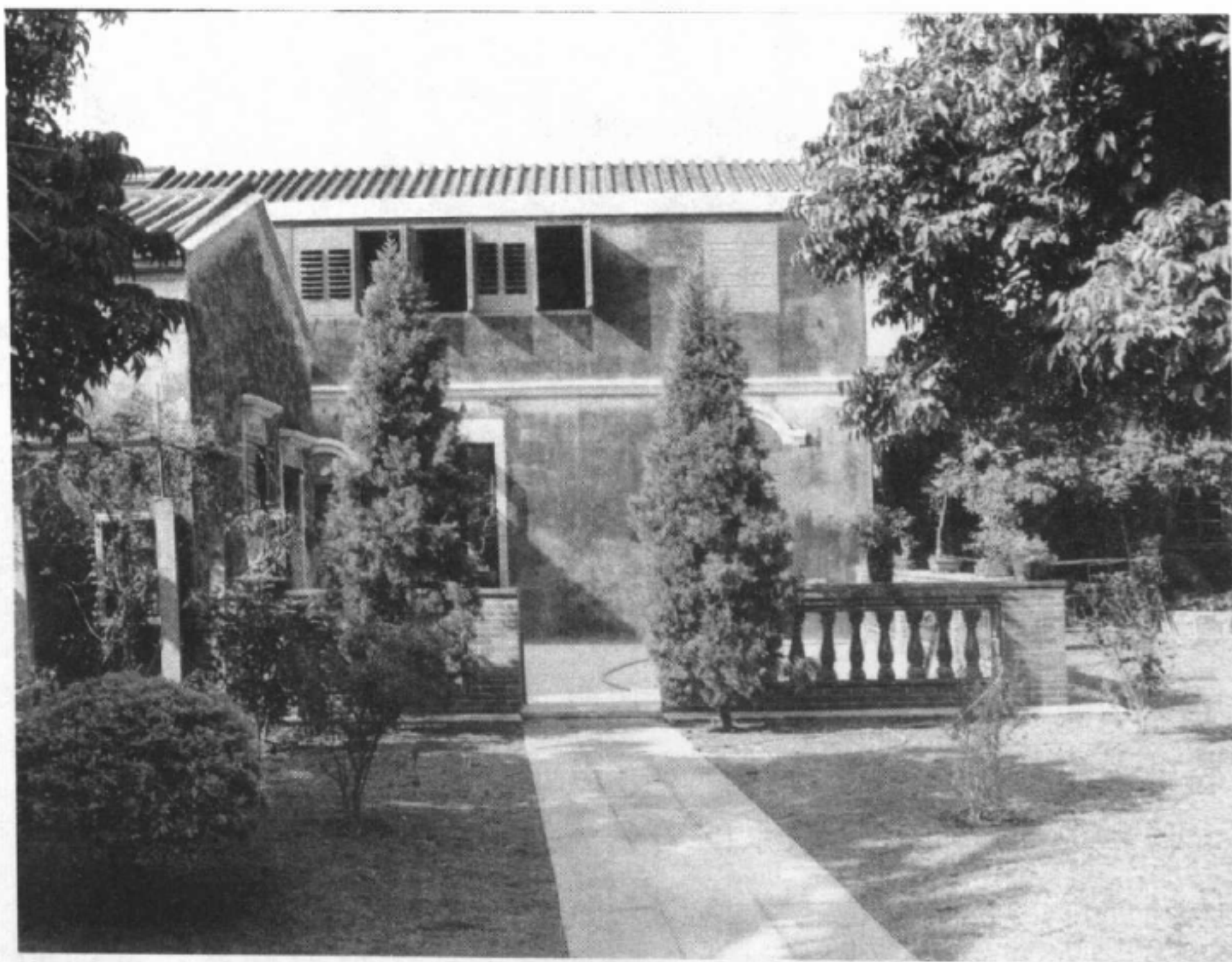
贸易进一步向外发展。正是这样一个濒临港澳、接近外洋、较早受到欧风美雨浸润、得近代风气之先的环境，使香山唐家人最早走出封闭，最早接纳西方文化而受益匪浅。近代以来，不少与洋务活动有密切联系的著名人物就是唐家或香山人，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由于与洋务的关系，还有不少人赴港澳和海外就学。香山南屏（今属珠海市）人容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为近代开中国留学欧美先河之第一人。容闳走出国门，又为更多中国人走出国门起了示范和楷模的作用。在他的积极倡议和奔走促动之下，经过洋务官员曾国藩等奏准，中国政府终于推行了他设计的派遣学生留学美国的计划。近代风云



唐绍仪传

人物唐绍仪正是这个计划的受益者。

唐绍仪，字少川，1862年1月2日生于唐家村一个中等农民家庭。父亲唐永大，号巨川，是唐氏宗族定居唐家后的第20代。母亲为本村梁姓人氏。唐绍仪兄弟6人，姐妹8人，他在六兄弟中排行第4。据说他出生时，正巧家前室后的万年青开花，母亲认为他“与众不同”，所以，在众多子女中，父母对他尤为疼爱，而为他成长花费了比其他孩子们更多的心血^①。唐绍仪后来的成就证明他没有辜负父母的厚望。



唐绍仪故居

^① 梁超润、唐仕进：《唐绍仪家世资料》，珠海市政协、暨南大学历史系编：《唐绍仪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342页。

二、西式教育的成长历程

远渡重洋 留学美国

在讲究传统功名的社会里，一个普通农民的子弟，如果没有特殊的机缘，是很难崭露头角、飞黄腾达的。唐绍仪的机缘，得自于洋务运动的兴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为了应付“千古未有之奇变”，开始兴办以“求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编练海陆军、制造枪炮船舰、兴办近代化工矿企业。由于中国极端落后，无力自造，必须向洋人学习。向洋人学习，就必须与洋人接触，培养洋务人才。这时，广东香山南屏人、近代中国第一个留美学者、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看准时机，向洋务派官员提出了他设计已久的教育救国计划。1868年，容闳首先对“具有进步倾向”、“且勇于实行一切改革之措施”、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陈述自己的教育计划，丁氏大为赞许，并嘱速具条陈。容闳在条陈中提出：“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四批，按年递派，每年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丁氏接到条陈后，立即将之寄送总理大臣文祥，请文祥上奏。不久，文祥丁忧，此事遂遭搁置。1870年，丁日昌奉诏北上天津协同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丁氏遂请容闳为翻译咨询，偕同到天津。此期间，丁氏又多次向曾国藩提及容闳的留学计划，并推荐刑部主事陈兰彬与容闳“可胜携带子弟出洋之



唐绍仪传

任”，终于得到曾国藩同意，将留学计划上奏。同年冬，此项计划获得清廷批准^①。其后，曾国藩、李鸿章于1871年9月3日联衔上奏《挑选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12条，对出洋幼童的选拔条件和办法，以及留学经费的筹措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翌年2月7日，曾、李又奏呈《选派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6条，5月17日，奕訢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再具专折，对留学章程进一步提出修改意见。这些洋务官员的支持，使中国近代官派留美计划终于启动了。从1872年开始，清廷连续4年共选拔了120名幼童派往美国留学，计划以15年为期。这就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派留美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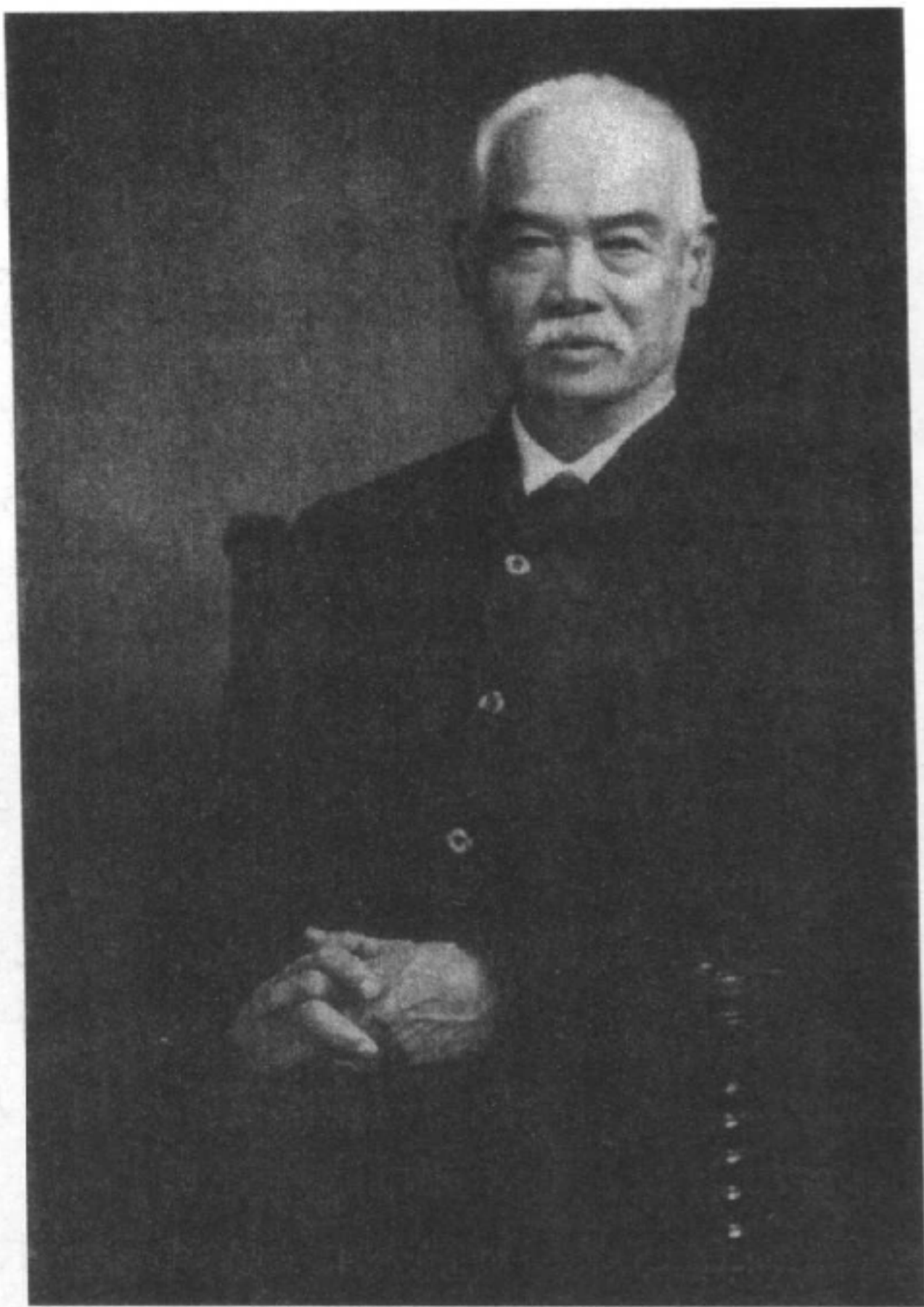
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包含着容闳希望改造中国、维新中国、使中国文明富强起来的爱国情怀，也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必然举措。但是，因为中国人长期受着“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影响，鄙视外国人和外国文化，认为自古以来只有外国人到中国留学，只有中国人对外宣扬国威，传播中华文化，哪有中国人远涉重洋去学习外国文化之理？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下，虽然清廷明文昭示：挑选幼童不分满汉子弟，不歧视汉族子弟，学成回国后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但仍无清朝贵胄、仕进显宦的子女问津，以至选拔的120名幼童中无一名来自士大夫家庭。传统士大夫仍然只热衷于科举之途，普通老百姓也极少有人将出洋留学视为荣耀；而凡被录取的幼童，均要出具年貌、籍贯及亲属甘结，15年内不能回国，“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政府概不负责，这更使得出洋留学被人们视为险途。于是，即使洋务官员在留学章程中拟定在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思想比较开放的东南沿海地区挑选聪慧幼童，仍没人愿意让自己的子弟背井离乡到国外去，以致容闳的

^① 江村：《丁日昌生平活动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招生遇到困难。最初留学预备学校在上海招生时，未能招满30人的定额，容闳特地南下香港，在港英政府所办的学校中遴选学生，又通过唐廷枢、徐润的襄助，从其家乡推荐人选^①。结果，在120名幼童中，广东学生占了84名，其中香山籍学生占了40名，为总人数的1/3^②。这个数字反映出当时的广东、尤其毗邻港澳的香山，人民思想开放程度远远超出国内其它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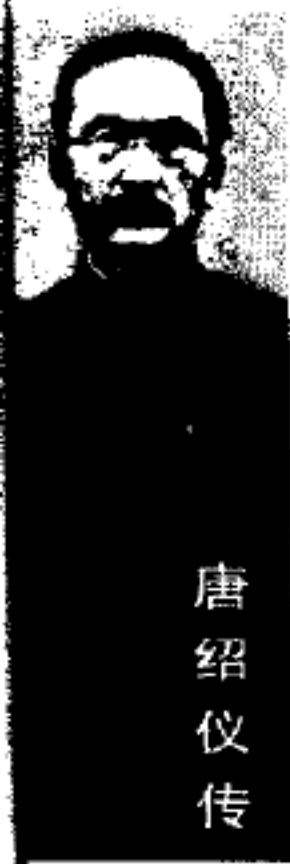
Tang Shao Yi



开创中国近代留学
教育事业的先驱者——
容闳（1828~1902年）

① 唐佑均等：《唐廷枢传记》，《珠海文史》第7辑，第41页。

② 温秉忠编：《最先留美同学录》，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46号，第13~18页。



唐绍仪传

广东香山人因受惯了欧风美雨的浸润，又有容闳留美的示范作用，而将出洋留学视为“洋翰林”之光明仕途，很乐意将自己的子弟送出国外读书。唐绍仪不仅出生在这样一个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又是出生在一个早与洋务有密切关系的家族。唐族老一辈乡亲于1860年前后，即在上海经营工商业或为洋行买办。如唐绍仪的族叔唐廷枢10岁就入香港玛礼逊学校读书，曾与容闳同学，并成为终身知交，后任怡和洋行买办、洋务要员；唐绍仪的父亲唐巨川在上海经营茶叶出口生意，与欧美人士也多有交往而深染外洋气派，认为欲谋子弟出路，非学习洋务不可，而让唐绍仪到上海专习外国语言文学。所以，当清朝选拔幼童赴美留学之时，唐绍仪由于其族叔与容闳的友谊关系而被推荐，母亲也力排众议，说服叔伯乡亲，送他出洋留学^①；而其出生于中等农民家庭的背景，也符合清廷所定之“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的招考条件。这样，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中西学基础的唐绍仪，在1874年12岁时就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

沐浴自由 逐渐西化

1874年9月19日，唐绍仪、梁如浩等30名幼童由祁兆熙带领，从上海出发，道经日本，横渡太平洋，从一个闭塞落后的封建国度来到开放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之邦。抵美之初，唐绍仪被分到康涅狄格州的哈德福城一知识分子家庭，主妇为小学教师，对唐爱护有加。唐从小学进中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文科。

本来，受过西方先进文明陶冶的容闳，苦心孤诣地设计派遣留学生的计划，是希望幼童们经过美国社会环境的长期陶冶，接受完全的西方文明教育，以求“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

^① 梁超润等：《唐绍仪的家世资料》，《唐绍仪研究论文集》，第342页。

良东方之文化”，使清朝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但是，清廷“师夷长技”之根本目的是为了制夷——对抗西方文化，以维护封建统治。因此，按照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清朝政府只要幼童学习西方科学知识，而不能接受西方的思想观念，也就是只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保留中国传统的脑袋。清廷为了防止幼童“囿于西学”，从留学监督人员的安排，到幼童学习生活的管制，无不以封建伦理纲常和道德修养为准绳。留学计划的倡导者和设计者容闳被认为“汉文未深，又不甚识大体”，不符合“中学为体”的要求，只能派为“出洋肄业局”副委员，而由“老成端谨，中学较深”、“志正体直”的翰林陈兰彬为正委员，以牵制容闳，避



Tang Shao Yi



1874 年，唐绍仪（右）与梁如浩（左）赴美留学前的留影。



唐绍仪传

免出现“流弊”，防止幼童西化。留学章程规定：幼童带赴外国后，悉归委员管束，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入学之初，所习何书，所肄何业，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四月考验一次，年终注明等第，详载细册，咨送上海道转报”。为了严格管制幼童，清廷专门在美国哈德福城设立一个“留学生事务所”（幼童出洋肄业局），除负责幼童的各种开支外，专聘有中文教习，专教幼童们四书五经，并作文考试，以免忘本。事务所还专辟一间屋子祀奉先圣孔夫子，住在事务所附近的学生每天先到事务所拜孔子，再去学校，目的是使幼童身在国外，仍能接受孔子思想的洗礼，不因接受西洋教育而忘本^①。这些规定与容闳设计留美计划的初衷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幼童们身在美国，但并不能舒畅地呼吸自由空气，不能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羁绊。唐绍仪后来能够与教育背景、家庭出身截然不同的袁世凯志趣相投，结为心腹，不能说与此无关。袁是唐后来政途升迁的得力靠山，从这一意义来说，唐绍仪在晚清的迅速崛起，既得益于洋务运动的兴起使他得到西式启发教育，也得益于他受到的新教育、新思想之不彻底与不充分。这种特殊阅历，使唐成为新旧思想交替时期的一个早产的新人物。

但是正如容闳所说，这些幼童到了新国度，日受新教育之陶冶，且与美国人交际，“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固有不期然而然者……况彼等既离去故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同侔，好为种种健身之运

^① 傅维宁：《早期留美史话》（二）——为纪念中国首批官费幼童赴美一百周年作，《中外杂志》第12卷第3期，第87-88页。

动，跳掷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①。美国学者也认为：“中国不可能只学习我们的科技及工业物质文明，而又不带回政治上改革的因素。那样，中国将会一无所得。”^②事实证明，留学监督的严厉管束，并不能阻止幼童们思想观念的潜移默化。可以肯定，从初步登上美国土地，幼童们的感受就一定非常深刻。那鳞次栉比的整洁民房，树阴草地中的高楼大厦，市区蜂窝似的繁荣商场，这就是他们日后生活学习的环境。尤其是作为留学副委员的容闳采纳美国朋友的建议，将幼童分散开来，分住在美国家庭中，幼童受到美国人民的热情接待和“家长式的爱护”。十多岁的孩子，正是身心发育成长的时期，住美国家庭，上美国学校，天天和美国孩子在一起玩耍，呼吸自由独立空气，亲身目睹美国人民共同生活中的民主方式及无数其它有意义的活动，生活习惯和理想观念必然很快美化，由易服剪辫，而改信基督，向往民主共和制。

唐绍仪就是在这样充满自由和欢乐的环境中，在西方的放任与启发式教育下，增加了对西方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了解，而且在性格的塑造和思想的养成上也受到了极深的影响，使他具备了中西合璧的人格。民国初年，唐曾告诉别人，他被召返国后首次跪谒李鸿章时，因假辫滑落，惶悚莫名^③。辛亥南北和谈时，他也曾说过早年在美受西式教育时，即已醉心于美国的共和制度。据庄泽宣《悼少川先生》文中所述，西方观念以及自由文明的政治制度对他影响很大，以至他后来返国朝见皇太后时，总跪得不自然，因此西太后赏他一个“鬼子”的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103页。

② 高宗鲁编译：《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传记文学》第34卷第6期。

③ 胡光煦：《早期出洋的游学生·一八七二——一九一二》，《传记文学》第34卷第2期，第73页。



唐绍仪传

绰号^①。西方文化的熏陶，对唐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培养了他不同于传统旧式官僚的思维方式、政治信仰和任事风格，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和思想走向奠定了基础。唐回国进入清朝政府部门工作，自然地将西式观念和风格带进了封建肌体之中，从而发生酸酵作用，有利于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变。

被撤回国 晋身仕途

作为近代最早的官费留美学生，中国改革的最先受益者，幼童们是幸运的。然而，他们又是不幸的。因为中国的改革处于初创阶段，当时提倡洋务者只是少数，而“以西法为不可行不必行者几乎盈廷皆是”，一切新事物都必然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极端反对。正如其它洋务事业受到重重阻滞一样，顽固派对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举措，从没停止过反抗。在灵魂深处仍严守“夷夏之防”，被朝廷派来牵制容闳和监管幼童的“留学生事务所”正委员陈兰彬及其继任者区谔良、吴嘉善等，绝不让幼童超越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轨道，不能容忍幼童们“西化”、“洋化”。幼童们寄居美国人家庭，平日随美国人同为祈祷之事，参加游戏、运动、易服改装之行为等，容闳认为是极正常之事，在陈兰彬等看来则是不正当的。对于外国的教育观念，他们更是极端鄙夷。为了一些琐碎之事，监督与学生经常发生冲突，容闳略为学生辩护，又被指为偏袒学生。尤其是1879年底，极端顽固的官僚吴嘉善新任监督后，颁布了更为严格周密的新规章，对重负之下的留学生施以更严厉的监督。他事事吹毛求疵，认为留学生学风不正，荒嬉佻达，慕外忘本，须严加约束。召集学生训话时要他们行跪拜礼，不拜就加以鞭笞，学生反唇相讥，则被辱骂为“畜生”，因此激起众怒，发

^①《宇宙风》（乙刊）第4期，第176~177页，1939年。

生殴打监督事件^①。结果，吴嘉善造谣中伤，说容闳“若何不尽职，若何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并促使清政府裁撤肄业局，将全部幼童撤回。他说“学生在美国，专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秘密社会，此种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②。这些耸人听闻的言辞，与国内顽固大臣的攻击言论互相呼应，使清朝政府深感不安，担心幼童受西方教育后，“将不复为卑恭之大清顺民”，故于1881年下令将全部幼童撤回，导致他们的留美学习半途而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还未完成学业的唐绍仪，也就此结束了7年的留美生活而返回祖国。

留美幼童作为清政府派遣的官费生，是为了洋务事业而培养的人才，回国后理当受到重用。经过7至10年西方文明陶冶，掌握了新知识的幼童们也满怀信心，憧憬着“中国会感激他们而赋予他们事业的成功和荣耀”。然而，被中途撤回的遭遇预兆了他们返国后将面临坎坷的命运。在讲究家族名望和传统功名、惟科举是正途的封建时代，留洋资历本来就不是仕途高升的有利资本，更何况幼童们是因为被认为越出了封建轨道（西化）而被撤还的。幼童回国后，被视为“无益于国家的人”，不仅没有受到政府的欢迎与重视，甚至被官方视同罪犯，押送到一个被荒废了10年的“书院”里，坐卧无席，衣食无着。在

① 罗翼群：《唐绍仪生平的概述》，《广东文史资料》第13辑，第92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3~104页。



唐绍仪传

传统社会的歧视目光下，幼童们无法学以致用。第二批留美幼童蔡廷干后来回忆说：“当光绪初年由美返国时，士大夫识见未开，对于吾侪不无意存轻藐，甚且出于疑忌。”独李鸿章等“二三有远识者，稍加颜色”^①。后经李鸿章奏准，94名返国幼童中的21名被派到天津电报局学传电报，23名被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其余“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唐绍仪即其中之一^②。由于幼童们在政治上备受歧视，经济上的待遇也非常低下，以致有少数人不堪忍受而离开洋务事业，或经商，或受聘于美国使馆，或重返美国完成学业。大多数人则服从了官方安排，“以基督教的耐心忍受了一切”，默默地报效祖国。直到甲午战争、尤其是20世纪初年之后，随着清政府推行新政，幼童们的社会地位才逐渐提高，结束了受排斥与歧视的命运。

与大多数幼童相比，唐绍仪则幸运得多了。1881年回国后，大多数幼童衣食无着，而唐因有亲可靠，丰衣足食，离开同学游玩探亲，不久，与父母为他选择的张氏女结婚成家^③。在事业上，唐也可说仕途顺利，很快便成为晚清外交新秀。唐

①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研究》总46号，第19页。

② 黎照寰：《关于唐绍仪的生平及其与孙中山、袁世凯、容闳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第50页。

③ 黎照寰：《关于唐绍仪的生平及其与孙中山、袁世凯、容闳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第50页。另据梁润超等编《唐绍仪家世资料》所记，唐绍仪先后取了三妻一妾。在唐绍仪十多岁赴美留学时，父母按中国旧俗为他订了一门亲事。若干年后唐绍仪杳无音信，对方父母遂有退婚之意。一天派人来唐家，见唐家境不裕，唐母正在打扫鸡舍，来人回去后添油加醋说了一顿，对方父母终于废除了婚约。某一天，唐父坐在门口石板上叹息，适值鸭江村一张姓泥水匠路过，问其情由，随即愿将自己两女由唐巨川择一配与唐绍仪。唐巨川于是择其长女为媳，此即元配张氏。后有妾氏“阿姨”，任职朝鲜时，又娶一朝鲜氏，1913年再娶继室吴维翘。

之能够迅速崛起，除了留美的经历外，原因之一是他不久就与清末重臣袁世凯结下了密切关系，其政治升迁有了得力的靠山；原因之二是唐具有精明的头脑和出色的才能，这是其得以崛起的坚实基础。唐绍仪才能的最初崭露，与袁世凯关系的奠定，均始于出使朝鲜时期，那是他步入政坛的重要阶段。



唐绍仪传

第二章 外交新星 崛起政坛

1882年，唐绍仪作为一名随员前往朝鲜，到1898年离开朝鲜回国，已官封三品衔候选知府。唐在朝鲜历任袁世凯驻汉城公署的西文翻译兼洋务委员、龙山商务委员，两次代理袁世凯“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甲午战争之后，再被派往朝鲜为华民总商董，后改为清朝驻朝鲜领事。因在朝鲜表现出色，1900年清政府叙奖在朝鲜出力人员时又加二品衔候选道员，令朝野人士瞩目。随后，唐出任津海关道，成为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外交代表，再次受到袁的赞赏，并为朝廷所青睐。不久，荣膺全权大臣，代表清政府与英国代表谈判西藏问题，挫败了英国吞并西藏的野心，从而奠定了进入清朝权力中枢的基础。

一、出使朝鲜 办理交涉初露锋芒

与袁世凯“一见契合”

清政府的冷落态度，传统社会的歧视目光，使幼童们深感失落。但只要洋务事业仍然继续，受过西学熏陶的幼童（幼童已成这些留美学生的特指）就总有发挥才干的机会。唐绍仪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文科，尤具外交才能。而近代以来，中国面临西方列强持续的侵略形势，如何在对外交涉中维护国家权益，已经成为政府的重要事务。办理外交，尤需外交人才，这就为唐施展才华提供了宽广舞台，使他得以通过出色的外交表现而迅速崛起于晚清政坛。

唐绍仪返国后，先在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见习，随后入天津税务衙门供职。不久，他得到了出使朝鲜的机会。这一机会对于唐来说，其意义在于：其一，在朝鲜结识了对他日后的政治生命影响至大的袁世凯，彼此结下了生死之交；其二，为唐展露外交才华提供了第一个舞台，这是他成为冉冉上升之外交新星的起点。

朝鲜（1897年改国名为大韩）本为中国藩属。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日本势力便乘机侵入朝鲜。1876年2月，日本以武力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开了侵略朝鲜的大门，加剧了朝鲜的民族和阶级矛盾。1882年7月，大院君（朝鲜国王的生父）利用下层人民对王妃闵氏集团反动统治的不满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发动“壬午兵变”。失势的闵妃集团为了夺回政权，急请清朝派兵相助。作为宗主国，清政府欣然允诺，派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率北洋海军7舰，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率清军6营前往帮助平乱。前已投靠吴长庆的袁世凯，也以营务处会办的身份随吴军到了朝鲜。在平乱中，袁以总理“前敌营务处”的职衔迅赴机宜，“胆识过人”，善于权奇应变，渐为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赏识。事后，袁复受命编练朝鲜军队，在朝鲜逐渐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物。平定“壬午兵变”后，清政府将大院君诱捕押禁于天津保定，并乘机采取一系列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措施。而历此变乱之后，朝鲜也更以倚清朝为安，开始效法清政府对行政机构进行改革，设立了“总理军国事务衙门”（内衙）和“总理



唐绍仪传

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外衙）。在这些机构中，由清政府推荐和委派“顾问”指导和监督一切政务。特别是交涉通商事务伊始，朝鲜缺乏人才，茫然不知如何下手，于是请李鸿章代聘贤明练达之士指导。10月，李鸿章奏准派前驻天津德国领事穆麟德前往朝鲜襄助海关事务，留美回国不久的唐绍仪、蔡绍基和吴仲贤等人则被推荐担任穆氏的秘书，随往朝鲜帮设海关，于11月抵达朝鲜^①。

1884年初，中法战争爆发，吴长庆调防奉天金州，分兵力3营畀袁世凯留防朝鲜。12月4日，朝鲜“开化派”在日本的唆使下，发动“甲申政变”。在变乱中，亲清的事大党领袖闵泳翊被刺伤，家人将他抬到税务司穆麟德宅中救治。袁世凯镇压政变时，得知闵泳翊在穆宅，便前往探询情况。在穆宅门口，有一人持枪而立，意气凛然，阻止袁兵进入。经询问，方知此人是清政府所派之帮办税务委员唐绍仪^②。

袁世凯是封建家庭出身之纨绔子弟，唐绍仪是受欧风美雨浸润的风发青年，虽然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文化教育背景截然不同，但两人都正值青春气盛之年，均以维护中朝宗藩关系的使命自任，希望通过自己的积极表现为日后的仕途奠定基础。于是，在“甲申政变”中亲执手枪护卫受伤的事大党领袖闵泳翊、表现机智勇敢的唐绍仪，与志锐气高、好大喜功的袁世凯在战斗中巧遇，便“一见契合”。稍后，袁因被日人指为擅启兵端，清廷朝野也责其处事孟浪，一时颇感内外交困，不得不离职返国。但唐、袁关系并未中断。

在袁离职后，朝鲜由于对中、日两国在朝鲜因利益关系而

①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979年12月印行，第121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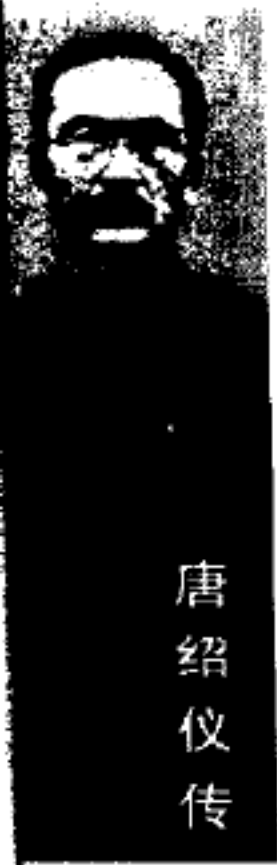
② 沈祖宪、吴闳生编纂：《容庵弟子记》第1卷，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7~18页。

发生冲突深感忧虑，惟恐中日决裂危害自身，故而在中日天津谈判（“甲申政变”被清兵镇压后，日本心有不甘，一面对朝鲜实行外交讹诈，一面派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李鸿章谈判，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日本取得了与中国共管朝鲜、日后有权出兵朝鲜的权利）期间，在穆麟德的策划下，企图暗结北方的俄国为后援，并与俄国订立了密约（史称第一次《俄韩密约》）^①。朝鲜“引俄背华”的事件引起了清朝的不安，李鸿章为此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放还极端保守排外、“壬午兵变”后一直软禁于天津的大院君回朝鲜以为牵制，二是再派血气方刚的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对朝鲜的内政外交加强控制。袁氏受任后，一面警告朝鲜国王不可轻易从事，一面全力迫使鼓动策划朝鲜投俄的穆麟德离去以断祸根。身为穆氏秘书的唐绍仪可能对穆氏的行为早已不满，因此，当1885年11月袁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职衔重返时，他立即投入袁氏麾下，以候选从九品的职衔出任袁氏汉城公署的西文翻译兼随办洋务委员。此后，唐始终追随袁世凯，“克惕自矢”、“竭忠尽智”地协助袁氏，与在朝鲜的各国势力角逐，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因他精通英语，谙练外交，故深受袁的器重和信赖，很快成为袁的重要亲信人物之一。任职不到5个月，即晋升为五品衔。

出任龙山商务委员

袁世凯在朝鲜骄横跋扈，颐指气使，凡于宗藩体制所系，利害攸关者，无不积极干涉，而这一切也有唐绍仪的参与和策划。“甲申政变”后，朝鲜的亲日分子金玉均逃亡日本，于

^① 林明德：《论第二次韩俄密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第519页。



唐绍仪传

1885年秋想结托日人进攻朝鲜，事前于大阪被揭发而失败。这事不仅对朝鲜刺激很大，袁世凯也深恐金氏与日本勾结不利于清朝在朝鲜的宗主地位，因此全力支持朝鲜应付可能的变局，并策划暗杀金玉均。袁的计划是派唐绍仪带朝籍勇士赴日行刺，他向总署奏称：唐“娴习洋务，胆识俱优，缜密老成”，“堪派往”^①。此项计划虽因朝鲜方面难以物色到合适人选而流产，但唐、袁两人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此外，一些外交礼仪的应酬，袁不能出席时，也由唐氏代替。如1891年3月17日，日本调兵护送已故日使灵柩回国，各国驻汉城使员同送到汉江。袁因病不克同往，就由唐率巡差代送^②。总而言之，在重大事件的谋划和对外交涉事务中，袁氏特别器重和信赖唐。1889年，经袁保荐，唐出任龙山商务委员兼驻仁川领事，独当一面地处理通商及交涉事务。

唐绍仪接任龙山商务委员后，立即对积延已久仍未破案的旅朝华商三和兴各商号先后被人放火烧毁房屋财货，并残杀华商多名的事件，向总署提出解决办法：由朝鲜外署一面勒限严缉各案人犯，务获究办，一面先行设法赔偿各商被焚资本，酌量抚恤死者家属，以示体恤^③。龙山距汉城仅5公里，唐就龙山新任后，仍兼袁署西文翻译、洋务委员，协助袁氏交涉各项事宜。如1890年7月，汉城发生的朝鲜商人抵制华商的经商垄断权的撤栈事件，即是经由唐氏调查处理。根据1882年清朝与朝鲜所订《朝中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华商在朝鲜享有种种经商特权，不仅交纳低于他国的关税，还可任意在各地从事商业活动。特别是朝鲜京都汉城的经商权为华商所垄断，后来日商也

① 沈祖宪辑录：《养寿园电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54页，光绪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电。

②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604号。

③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484号。